



阅读的乐趣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Ideological Age

[美] ()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Ideological Age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阅读的乐趣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Ideological Age

〔美〕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著

苏新连 康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乐趣 / (美) 罗伯特·奥尔特著 ; 苏新连,
康杰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6012-4

I. ①阅… II. ①罗… ②苏… ③康… III. ①文学欣
赏—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4051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阅读的乐趣

〔美〕罗伯特·奥尔特 著
苏新连 康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艺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12-4

2019年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13 1/4

定价: 42.00元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IDEOLOGICAL AGE

by Robert Alter

Copyright © 1996, 1989 by Robert Al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致谢

1985年的秋天，我曾与简·伊赛（Jane Isay）愉快地共进午餐，而我们谈话过程中就萌生了写作这样一部书的念头。我对简·伊赛感佩莫名，她前几年作为我的著作《圣经叙事的艺术》（*Biblical Narrative*）一书的编辑对我帮助良多，我也遗憾因为机缘不巧我们无法为本书的写作再度合作。以下诸位阅读过部分或者全部书稿：齐娃·本-波拉特（Ziva Ben-Porat）、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ein）、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rtman）、卡罗尔·考斯曼（Carol Cosman）、玛丽琳·费布（Marilyn Fabe）、本杰明·哈沙夫（Benjamin Harshav）和托马斯·施密特（Thomas Schmidt）。感谢他们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使我得以在书中避免更多的错讹之处。书中阐释的一些观点和文本经过了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课程学生的测试，而我则一如既往地他们的提问所展现的活力和评论所显示的机敏中获益良多。詹尼特·利文斯通（Janet Livingstone）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手稿打印工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文研究委员会为我提供了休假补贴，使我在学术假期期间完成了本书前两章的写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通过特殊基金为我提供了文秘和偶发的研究开支的经费支持。

诺顿版序言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正当我接近完成《阅读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Reading*）一书写作的时候，“宏大理论”在美国文学研究界的声望虽然巨大，但也刚刚开始式微。其在哲思方面极具战斗性的趋势，即解构主义，已经过了其鼎盛期。自那以后的几年里，那场运动逐步衰落成为一个历史奇观。宏大理论，无论其多么泛滥和概念上的弱点如何，大概还是留下了积极的存留物，因为当今对于文学的讨论比一代人之前毕竟在理论上更有依据、方法上更具自我批判性。我自己在写作本书的基本假设曾经是——并将继续是——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理论是一种必要的而且是明晰化的活动。我本人对于宏大理论所持的异议在于其以理论的学习来取代对于文学的学习的旨趣，以及其执迷不悟的、混乱的、自我矛盾的或是混淆视听的理论化。而所有这些迄今为止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与此同时，过去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是，至少是在我们的大学校园，身份政治（身份通常定义为性别、性取向或者族裔）已经愈发变得激烈，尤其是在文学系，在许多情况下使以前对于理论的强调显得像是过分文雅的奢侈品，虽然在某些情形下一些夸张的理论化语言被用来服务于群体身份。这种为受害群体代言的辩护已经广泛地决定了哪些文本应该研究——这在过去几年响亮地宣告过的关于经典的不确定性中处于核心地位——以及哪些问题应该讨论，即便是当传统的经典作品在课程表中得以保留的时候。在我看来，针对文学提出这些政治问题无可厚非，然而当这些问题受到近乎排他性的重视的时候，文学所能够提供的富足、多样化的洞察力、经验和愉悦就令人痛苦地受到贬损了。1989 年版《阅读的乐趣》所秉持的论点首先是反对这样的贬损，而这个问题现在比当时似乎更具有急迫的相关性。

所有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泛泛之论注定要错失他们论题多样化的现实，尤其考虑到美国存在着数量众多、门类各异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三万多名男女教师从事文学教学，而在我看来，是否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真正笃信理论，或者身份政治，或者任何介乎于适当的新闻摘要式的文艺思潮，我表示怀疑。美国现代语言协会 1995 年年会的重要议题是文学研究是否已经终结，然而图书销售数字表明，数以万计的教师继续指定学生阅读类似诺顿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文集这样的文本，以及经典作家的单部作品。其次，在学术圈以外，优秀的小说和诗歌基于其严肃读者群经久不衰的热情继续展现其巨大的活力，即便是在学术垃圾在畅销书榜单上占据榜首位置的时候。

许多教师和学生出于对文学共同的热爱依然聚首在课堂上，或许他们会感到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下，他们已经成了被迫改变信仰的马拉诺人。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副总编辑阿多夫·伍德（Adolf Wood）在一篇文章（1995 年 11 月 17 日）中报道了一个强调文学想象的权威的新的美国学术组织，他感到不解的是，现在是否恐吓氛围在许多文学系里大行其道。但是他也对于这个新组织的成员表现出了谨慎期望的态度：“谁知道呢，也许潮流已经变得对他们有利，也许他们在全美国人文系科所主张的‘零星抵抗’在数量上和影响上会有增长，也许‘反革命’行动即将来临呢？”或许第三种揣测多少有些异想天开或者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但是如果我假装知道文学研究在整体上行进的方向，那会是愚蠢的。可以肯定的是，有那么许多教师，以及数万名学生，在他们对于文学的追求中，他们被占据支配地位的学术正统以不同的方式搅扰得发生偏离或者心烦意乱。本书的写作正是为了他们，也作为一个系统的邀约以再次召唤对于文学体验独特的满足感，尤其要考虑到此时此刻文学已经变得像是一个政治的角斗场。

于伯克利

1996 年 1 月

目 录

引言：阅读的消失	1
第一章 文学的区别	13
第二章 人物及其与现实的关联	37
第三章 风格	61
第四章 典故	92
第五章 结构	119
第六章 视角	145
第七章 多重阅读与不确定性的泥沼	174

引言：阅读的消失

显而易见，文学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回应这一奇怪的潮流，虽然著作的本意远远超出一般的辩论，因为我深信，对于一位批评家来说，总是有更有趣、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仅仅是揭露一些时髦的荒诞。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我在开卷之初投入一些精力阐释一下与我所从事工作相对立的骚动或许是有益的。

当今许多最具影响的批评和文学理论潮流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希冀和知识激情的年代。法国是大多数新思潮肇始的地方。在那儿，学术批评的枯燥艰涩遭到极具胆识的以语言学 and 人类学为基础的系统分析戏剧性的替代，旨在为文学研究在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中争得一席之地；遭到对以结合了文学和哲学文本研究的西方哲学前提的根本性质疑的替代；也遭到了通过大幅修正了的弗洛伊德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曾经结合并超越了两者的基于“文本”的历史主义视角对于文学的审视的替代。在英国和美国，文学批评从整体而言在概念问题上已经变得捉襟见肘，而且对于系统的文学层面问题并不十分感兴趣。因此，这些创新性的思想似乎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对于文学的讨论将不再是身着舒适的花呢外套、手里举着烟斗沉溺于其闲谈式但又志得意满的学识的知名英语教授的

2 阅读的乐趣

专属领域了。文学最终将以知识的严谨性的方式进行研究，其研究基础是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政治、历史、个人和性别身份领域里最为急迫的问题将通过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得以大胆地揭示出来。

所有这些骚动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有其值得称道的一面。正如数位观察家所言，英美文学研究当时事实上是处于“欠概念化”状态，并且在其知识视野方面还趋于表现出地理上的狭隘性。与此同时，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一般被认为是未经检视的信仰问题——从一方面说，在英国持这种观点的人是 F. R. 利维斯（F. R. Leavis）的追随者，从另一方面说，在美国持这种观点的是纽约批评家和新批评家。可以肯定的是文学研究必有所获，其途径或是利用抽象思想的不同体系的组织来观察文学，或是通过追溯文学自身的系统运作，或是用更为怀疑的态度看待文学为其自身所提出的主张。这三种宽泛的认知模式中，取得最为实在的成果的是专注于将文学视为一个体系的模式。就此而言，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叙事学、德国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苏维埃符号学以及特拉维夫诗学学派。然而，在许多方面，二十年前伟大的期许已经变成了苦涩的灰烬。

在我看来，最为核心的挫败是，在整整一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已经远离了阅读。我这样表述的部分理由只是说，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谈及弗洛伊德时所称“怀疑诠释学”的各种版本已经超出了怀疑本身，甚至接近于对文学的鄙视态度。无论是在文学批评还是有关大学课程的争论中，人们总会遭遇到这样的观点，即报纸、低俗小说、私人日记、临床病例研究以及想象性文学都属于同一层次，如果它们之间有任何区别，那也主要取决于形式上的问题。人们不必为对于文学毫无保留的谄媚态度而辩护，然而如果缺乏对于文学作品某种形式的热情参与，如果缺乏对于阅读体验深度的愉悦感，那么有关文学的教学和写作的整个行当将很快变得毫无意义。

事实上，就文学研究中的许多新思潮而言，前置词“关于”的目标通常不再是文学。当今伟大的前缀是元-（meta-）：元语言、元文本、元语

篇。谈到我们如何谈论文学的问题时，确定无疑的是，关于对讨论的前提的讨论，也就是对如何谈论文学的讨论，对于维持对方法论的顾虑是必须的。令人感到困扰的是，对于第二学位的学生来说，类似这样的讨论在许多情况下将足以取代对于文学本身的讨论。人们文章一篇接一篇地读，讲座一个接一个地听，而通篇没有看到引用一部文学作品，也没有任何真正的阅读体验。虽然还没有人对目前的教学大纲做过精确的量化研究，我强烈怀疑许多正在我们最好的大学攻读英语或者法语本科学位的学生因为乔治·艾略特或者司汤达的每一页作品读过两三百页拉康、德里达、福柯和克里斯蒂娃的著作。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学生们应该被送回某个只阅读文学的假想的田园诗般的年代。时至今日，大量知识概述和跨学科视角的价值应该不言自明。事情的关键是比例问题：在所有人都被赋予一定量的时间可供阅读的情况下，不管是在校内或是校外，一个读文学的人，难道应该让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阅读拉康而不是坡？去阅读巴特而不是巴尔扎克？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质疑，这样一个特殊的思想家群体是否能给学生们最好的指导。正如吕克·费里（Luc Ferry）和阿兰·雷诺（Alain Renaut）曾经敏锐地指出^①，这些思想家代表了德意志思想——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还原性的法国修辞激进化，它可能会引向一个学术的死胡同。

前不久，我的本科比较文学课上的一位年轻女士告诉我说她是多么喜欢阅读《白鲸》，而这个班刚刚在这部小说上花了三周的时间。奇怪而有趣的是，她特别喜欢这部书的竟然是其怪诞的幽默。这种怪诞的幽默令她喜不自禁，虽然麦尔维尔是位缺少生活感的作家。她还告诉我说她对于自己的阅读反应都感到吃惊，因为在前两个学期，她自己英语专业的两位教授跟她说《白鲸》这部小说枯燥无比，基本不值得花力气去读。这其实很容易理解为是这个时代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也证实了一个揣测，即文学系正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并不特别喜欢文学的学者。我并不主张人们必须

① 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68年思想》（巴黎，1985年）。

按部就班地尊崇文学作品，或者说质疑所谓的“经典”就是不妥（我将在本书的第一章对于“经典”这个概念颇有问题的本质谈谈我的观点）。针对《白鲸》当然可以提出有争议的不同意见——即小说有时候显得夸夸其谈；因为涉及许多捕鲸的掌故而显得头重脚轻；小说的叙述者前后矛盾或者甚至缺乏可信度；作为人类生活的缩影，小说显得极度不平衡，因为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等等。然而毫不掩饰地说，这部小说也是美国散文作品的一个惊人成就。这部小说即便有其令人不快的一面，它依然萦绕在人们的想象中，它一次又一次地令人鼓舞、令人不安、令人激动，而且据我学生所说，有时还让人觉得有趣。人们当然可以合情合理地与《白鲸》争辩，但是一位讲授文学的教师居然将其贬斥为枯燥得不值得一读的作品，他还不如去教计算机科学或者去卖保险。

又或者，为了给予新的学术思潮应有的地位，这样一个人还不如去教社会学或者历史学，教心理学或者政治学，无论系里的决定是什么。这就是说，将文学文本应用于社会、文化、哲学或者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其真实的学术价值。虽然人们对于有时考察这些问题时表现出的社会政治意识倾向性会郑重其事地表示疑虑，类似的研究在大学里当然有它的一席之地。把文学视为别的什么东西的症候——比如说鼎盛封建主义或者晚近资本主义——既不需要对于文学特别喜爱，也不需要区分非原创作家和原创作家以及二流作家和一流作家的能力。这样的研究或许有其自身引人入胜的特点，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在思考文学规划前景的时候，这样的研究方式竟然不是作为一个补充方案，而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或者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这方面就表现出了令人称道的坦率和一致性，他所主张的课程改革将重心从文学转向“语篇研究”，这样在一门单一课程里，教师将得以自由地讲授莎士比亚、电视剧本、政府备忘录、漫画书和广告文案，以此作为权力语言的事例。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也是典型的某种时下流行的对于社会批判的强制性，伊格尔顿还主张取消文学系，因为他已经至少令自己满意地证明没有一个条理分明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文学。

关于以上的最后一个主张我将在本书第一章里详谈，但是我想在此强调，本书通篇的要点是，在文学的内在运作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关注，无论是我们还多么希望超越文学文本而进入其各式各样的语境。其次，类似这样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承诺将所考察的文本“丰碑化”，或者将其视为纯粹的审美客体。恰恰相反，正如我希望用我的事例所表明的，许多——或许甚至是大多数——原创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强大的颠覆工具；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矛头指向现行的信条和社会政治意识；虽然与原初的文学概念相悖，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和道德态度。对于文学如何通过其复杂而独特的语言发声的细微关注是在充分地理解文本的颠覆力量过程中不可或缺步骤。关于这一点，《白鲸》以其对于意象、象征、典故、场景甚至是有节律的运动以引发对于自然、历史时间、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性重新定义的非凡设置而成为再好不过的事例。

20 世纪 60 年代末那个期许的挫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疏远——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即是实际的疏离——了我所说的文学阅读的体验。其二是文学学术研究分化成为彼此竞争的派系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其自己的信条和自己晦涩的语言，尤以美国的情形为甚。宗派化自有其长久的吸引力，至少是对于学者和对于他人而言都是如此，因为对于新入门的人来说，它提供了一种令人安心的确定性和优越感，尤其是相对于未曾入门的大众而言。新型的学术宗派化或许是发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大学系统史无前例地进行扩张的直接后果。由于有十数万人在数千所高校讲授文学，而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和书籍像兔子一样地繁殖，一位年轻的学者或许会通过追随一位大师、采用一种“先进的”方法、借由一种近乎僧侣的语言来表达对二者的忠诚来获得超越喧嚣的人群的某种令人惬意的提升。

语言问题是文学研究中这种总体知识混乱的最为严重和最明显的症候之一。在批判性写作中，风格标准的下降虽然令人惋惜，但作为一种审美问题，它依然是处于第二位的——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些圈子里，现在能把文字写得糟糕或者令人费解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美德，甚至至

少有一位著名学者举起了“难度”大旗作为批评散文的主要目的和标记。与阅读消失这个令人不安的前景更为相关的是，现在的批评语言经常反映所讨论文本中想象性生活的情感异化，在其丰富的概念中经常显得阅读体验空间很空洞。

抽象化当然是思想的必要工具，但是许多当今批评的风格习惯反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倾向，即将批判性讨论进行抽象化，从而远离文学文本实际向读者呈现的内容。这一倾向的一个症候就是以 *-ize*（英语动词后缀，意为“……化”）后缀结尾动词的疯狂扩散：在当今，一首诗或者一部小说里的几乎所有东西都问题化、主题化、叙事化、总体化、历史化、偶像化。在某些研究框架下，专业术语或许有其价值，但是学术用语频繁随意地使用只能造成真正的不准确，或者是作为缺乏原创思想的掩饰，关于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当下的学术期刊就清楚了，而那些刊物里写得满满的都是什么“语篇”“话语策略”“文本情爱”“直观感受”“前景化”“所指”“难题”，等等。

我来举三个例子看看那么多学者是如何讨论文学的。这些事例来自前一两年发表的文章中。考虑到面子问题，我将省略文章的出处和作者姓名。

第一段摘录来自一篇研究卡夫卡的文章：

到处都是移动的障碍和非指涉的元素，它们指向恋母情结场域以外的欲恋的生产，并撕裂具有压迫性的整体性，这不啻为卡夫卡实验机器的证明。

文章原文：

Everywhere there are moving barriers and a-signifying elements which point to desiring production outside the oedipal domain and rend apart repressive totalities, a testament to Kafka's experimental machine.

毋庸置疑，普通的读者将从中理解甚少，而在我们随后将看到的另外两个例子中，他们能读懂的更少。然而对于此类批判性写作来说，难懂性似乎

是最不严重的指责之一。毕竟有数目限制的一些专业术语可以通过几个小时的勤奋阅读得到掌握，而其支持者可以据此争论说他们取得了新型的准确性。以上的例句可能对于读者颇有排斥性，然而真正棘手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难理解。短语“移动的障碍”中“移动的”（原文为“moving”）是个分词，而“欲恋的生产”中的“欲恋的”（原文为“desiring”）则具有动词状形容词的力量，似乎可以表述为“欲望的生产”（原文为“the production of desire”）。本篇文章作者所使用短语背后的概念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混合物，而且措辞还反映出当下人们对于机械隐喻的喜爱（比如指认卡夫卡的反传统小说为“实验机器”）。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二章细说。潜伏在所有这些令人生畏的语言背后的是关于卡夫卡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由那些并不使用新式文学专家政治论者的术语的批评家优雅地并且颇有教益地表达出来的：卡夫卡发明了一种神秘小说的模式，这种模式开发了一个早期的无意识王国并且对抗常规的阐释习惯。再进一步说，人们怀疑那种解放论语言（“撕裂具有压迫性的整体性”）对于卡夫卡那富有想象的事业的动机和感受是否完全恰当，或者是否正如当代批评中经常发生的情形那样，文本被不假思索地置于一个预制的意识批判框架中，而这个框架在某些方面则歪曲其实际外貌。

我的第二个例子来自对于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评论：

创作的形成可见性必须在纲领性的等式或者认同的层面上加以思考，而我认为，这一等式或者认同确保了现实主义话语。这一等式涉及到创作的本体论和社会身体—机器联合体的特定材料——即特定的历史主题——之间完美的“匹配”，亦即创作的（显然是非可历史化的）本体论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生物力学之间的完美“匹配”。

文章原文：

The becoming-visible of writing must be considered in terms of a programmatic equation or identification that, I want to suggest, underwrites realist discourse. This equation involves the perfect “fit” between the

ontology of writing and the specific material—the historically specific subject-matter—of the social body-machine complex, the perfect “fit” between the (apparently nonhistoricizable) ontology of writing and a historically specific biomechanics.

在这位作者的文章里，寻常的机器隐喻变得直白明了，而且确实是概念性论证中的自觉因素。在19世纪的生物力学和现实主义小说之间是否真正存在着这一匀称的对应关系的问题超出了我们当前的考虑范畴，然而彻底地离开文学文本进入大的历史语境当然是完全疏离于小说的这种沉闷的语言促成的。人们怀疑这是海德格尔的影响，或许是经由萨特（“创作的形成可见性”）那令人讨厌的风格的中介。引文第二句话里的句法折叠和术语混乱是如此恶劣，以至于有人怀疑文章的作者究竟能从克莱恩的创作中搞清楚些什么。现实主义膨胀为“现实主义话语”大概是源于福柯的影响，而对他来说迂回的和压迫性的话语决定了大多数在文化里发生的事情，而且必须牢记的是，“话语”是当代批评中一个突出的普遍冒犯者。作为二元对立中与叙述（法语为*récit*）相对的一方，“话语”一词有其明确的功用，但是现如今人们发现这个词已经取代了风格、修辞、言语、措辞、叙事技巧、叙事结构、虚构的呈现、作为形式系统的语言等等。

我的最后一个例子来自一篇研究 J. L. 博尔赫斯（J. L. Borges）的文章：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博尔赫斯和圣经阐释之间的各种对应关系，即在互文性思想方面、在不是作为线性而是作为文本空间的布局的阅读概念方面、在文本作为解码条件的去结构化的观念方面，以及如我所以说在阐释的元文本性作为去中心化基础的拱形结构原理方面。

文章原文：

What seems to me important are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Borges and midrash in the idea of intertextuality, in the concept of reading not as lineality but as a configuration of textual space, in the notion of the

destructurization of the text as a condition for deciphering it, and in the arch principle, as I have said, of interpretative metatextuality as the basis of decentralization.

这样一个杂乱无序的句子是行话和时髦的不准确性名副其实的集合体。在这个例子中，对于宗派行话的嗜好导致说出来的话近乎胡言乱语。这其实就是用一种模糊甚至可能有误导的方式说，类似《罗盘旁的死亡》（*Death by the Compass*）或者《交叉小径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等小说的阅读体验是“一个文本空间的布局”，而那个奇怪的隐喻并不适用于圣经阐释，即关于圣经的早期教义学说注释。一旦破解了其中的术语，“阐释的元文本性”一语事实上指的是博尔赫斯的执着，当然不全是关于圣经阐释，但即便是在这位阿根廷作家的事例中，这个概念与文本的去结构化或者去中心化都没有什么重大关系（我们随后会看到，对于后缀-ize“-化”的喜爱经常得到对于前缀de-“去-”依恋的补充，其用意是将物体拆开）。总而言之，这一关于博尔赫斯和拉比的评论正如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关于卡夫卡和克莱恩的评论一样，正是阅读的消失的症候，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倾向，即将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对于先入为主的并且过于笼统的观点的证明文本，而不是着眼于文学作品中微妙而引人入胜的具体细节。

那么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质疑新型批评流派的一些从根本上说具有误导性的信条，而是提出一系列旨在促成阅读的回归的观点。我认为文学的语言从来源上和表达的可能性上有别于其在其他场合的使用（第一章）；文学并不仅仅是一个自我指涉的封闭的回路，而是以有意义和启示性的方式与文本以外的经验世界相关联（第二章）；有这样一些文学表述模式可以通过恰当的批评方法介入，从而使读者获得关于文本的更为清晰的认知（第三章至第六章）；在我所赞同的阐释的多元化和阐释的混乱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第七章）。本书的核心，即第三章至第六章，同时也基本是非辩论性的部分，其立论基础是：实际上存在着某些可传播